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5 Nov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9 日

临时议程项目 3*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9/5 号决议提交的，目的是审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在社会层面取得的进展。它概述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包括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粮食安全与营养；获得适当的社会保障、体面就业、优质教育、医疗、其他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良政。它还论述了伙伴关系与资源调动，讨论了在确保协调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 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就加快非洲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 E/CN.5/2020/1。



一. 导言

1. 2001 年非洲联盟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为促进非洲发展、推动非洲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愿景和政策框架。此后,新伙伴关系的目标被纳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的《2063 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进一步推动了包括在非洲创建一个包容、繁荣与和平的世界、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行动。本次关于新伙伴关系社会层面的经常性报告审查了在实现《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所载社会目标,包括与贫困、不平等、就业、教育、卫生、粮食安全、性别、水和环境卫生、能源、基础设施和治理有关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它还突出显示了联合国各机构在采取全面办法规划和执行非洲社会发展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

二. 社会发展概述

2. 非洲在人类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进展不平衡且缓慢。根据基于 51 个指标综合衡量一国社会和环境表现的社会进步指数,自 2014 年以来,有 9 个非洲国家¹ 进入了社会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列。然而,许多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仍然远远落在后面,得分最低的 11 个国家中有 9 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²

A. 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

3. 非洲的收入贫困一直在减少,极端贫困率——每天生活费不到 1.90 美元的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45.5%下降到 2015 年的 35.1%。虽然北非的极端贫困率极为迅速地从 1990 年的 12.9%下降到 2015 年的 2.2%,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贫困率的下降速度要慢得多,同一时期仅从 54.7%下降到 41.4%。³ 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据 2018 年的数据显示,该地区 47 个国家中有近 60%的比率超过 40%,其中 9 个国家的比率超过 60%。⁴ 极端贫困在非洲非常普遍,即使是在有工作的人口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 2018 年,近三分之一(32%)的工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1.90 美元。极端贫困率非常高的国家往往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处境脆弱国家。⁵

4. 通过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指标来看待人口贫困情况的多维镜头来看,非洲的贫困程度甚至更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多维贫困的发生率(代表多维贫困人口

¹ 安哥拉、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吉布提、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² 社会进步势在必行,《2019 年社会进步指数:执行摘要》,2019 年。

³ 见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home.aspx>。

⁴ 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非洲:宏观贫困展望》(2019 年)。

⁵ 和平基金,脆弱国家指数数据库。可查阅: <https://fragilestatesindex.org/>。

的比例)虽然已有大幅下降,但仍处于很高水平——2019 年平均为 57.5%,⁶ 低于 2017 年的 60.1%。⁷

5. 经济增长在许多国家仍然主要由商品和矿物出口推动,一直是支持非洲减少收入和非收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增长既不能持续,也没有包容性。事实上,近来增长已经放缓,原因是全球商品价格下跌,引发了一些不利影响,例如财政紧缩,限制了政府在社会方案上的支出能力,进而减缓了消除贫困的速度。此外,非洲的增长并未带来快速的结构转型和就业机会,伴随而来的是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增长未能惠及所有人口。例如,资本密集型矿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通常很少,而且与其他经济部门脱节。

6.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仅出现了增长放缓(从 2017 年的 3.4%下降到 2018 年的 3.2%),⁸ 而且还面临人口迅猛增长的问题。这两个因素相互叠加,使得生活贫困人口增多,尽管比例在下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贫困人口从 1990 年的 2.8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4.13 亿,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⁹ 在人口最多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多维贫困人口也有所增多。

7. 由于起点高、降速慢,极端贫困率在一些国家甚至有所升高,预计到 203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23 个国家的极端贫困率仍将超过 20%。¹⁰ 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变化来加快消除贫困的努力,该地区不太可能在 2030 年之前消除贫困。

B. 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8. 总体而言,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2018 年,三分之二的撒哈拉以南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高于 0.40,而南部非洲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一般高于 0.50。¹¹ 尽管许多国家近来都实现了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水平提升,但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似乎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巨大且持续加大的情况。与其他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似的国家相比,非洲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这意味着非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往往总体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¹² 尽管非洲的

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2019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透视不平等”,2019 年。

⁷ Sabina Alkire 和 Gisela Robles,“2017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政策简报,第 47 号(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2017 年)。

⁸ 《2019 年非洲经济报告:为非洲可持续发展筹资的财政政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I.K.2)。

⁹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6)。

¹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8 年发展合作报告:合力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经合组织出版社,巴黎,2018 年)。

¹¹ 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非洲》。

¹² Emma Seery、Joab Okanda 和 Max Lawson,“两大洲的故事:与非洲的不平等作斗争”,乐施会简报文件(国际乐施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牛津,2019 年)。

收入不平等并没有系统性地加剧，但非洲极度富有的人数正在增多。非洲最富有的三个人比非洲人口底层 50% 的人(约 6.5 亿人)拥有更多财富。¹³

9. 在获得体面就业、基本社会服务(教育、卫生和水)以及土地、资金、基础设施和技术等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机会不平等现象也很严重。机会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专用于核心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共资源不足、公共机构薄弱且资源匮乏、治理不善、管理人口多样性方面面临持续挑战。¹⁴ 非洲大陆总体收入和资产不平等的大约 40% 源自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¹⁵ 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空间不平等在机会不平等中占了很大份额。例如，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几乎普遍落后于城市地区。

10. 性别是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过去十年来，非洲在增强妇女权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在 2008 年至 2017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对法律和法规进行的改革最多(71 项)，在许多领域增加了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如允许女性自由流动、为她们产后重返工作岗位提供便利、增加她们获得信贷进行创业或经营企业的机会。¹⁶ 在北非，由于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更愿意寻找工作机会，女性初婚平均年龄大幅提高到 25 岁。¹⁷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女性进入议会方面的进展微乎其微。女性在两院中的比例仅从 2018 年的 23.7% 提高到 2019 年 9 月的 24.1%。¹⁸

11.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但增强权能方面仍然持续存在性别差距。生产力和收入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而这些差距对非洲国家来说代价高昂。¹⁹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继续盛行早婚，超过三分之一(37.2%) 年龄介于 20 至 24 岁之间的女子已在 18 岁之前结婚。早孕也十分普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为普遍，有 27.8% 年龄介于 20 至 24 岁之间的女子在 18 岁之前生过孩子。早孕早育不仅会增加孕产妇和婴儿死亡风险，而且会限制青春期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前景。非洲妇女和女童面临的其他问题包括：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频发；继承法存在歧视；获得金融资产和服务(如开立银行账户)、体面有偿工作以及社会保障的机会更

¹³ Abebe Shimeles 和 Tiguene Nabassaga, “为什么非洲的不平等程度高? ”, 工作文件系列, 第 246 号(非洲开发银行, 科特迪瓦阿比让, 2017 年)。

¹⁴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非洲治理报告三: 选举和多样性管理》(2013 年, 亚的斯亚贝巴)。

¹⁵ Shimeles 和 Nabassaga, “为什么非洲的不平等程度高? ”。

¹⁶ 世界银行, “2019 年妇女、企业与法律: 改革十年”, 2019 年。

¹⁷ 妇女署, 《2019-2020 年世界妇女的进步: 变动世界中的家庭》(2019 年, 纽约)。

¹⁸ 见 <http://archive.ipu.org/wmn-e/world.htm>。

¹⁹ 世界银行, 《非洲的脉搏》, 第 20 卷(2019 年, 华盛顿特区)。

少。²⁰ 2014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因性别不平等造成的人力资本财富(预期收益)损失总额估计为 2.5 万亿美元，占该地区财富基数的 11.4%。²¹

C. 就业

12. 许多非洲国家经历的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大量就业机会。2019 年和 2020 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 2018 年的 3.4% 提高到 3.9%。相比之下，2019 年和 2020 年的就业增长率预计将从 2018 年的 3.0% 下降到 2.9%。²² 预计到 2030 年，非洲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增加到近 10 亿。按照目前的劳动力增长速度，非洲每年需要创造大约 1 2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以防止失业率上升。²³

13. 非洲 2018 年的失业率为 6.8%，预计将保持到 2020 年不变，其中北非的失业率(11.8%)是撒哈拉以南非洲(5.9%)的两倍。非洲的失业率低并不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表现良好，而是由于人们面临满足基本需求、摆脱贫困的压力，而不得不接受任何就业机会，无论工作条件如何。因此，大多数就业人口从事的是工资低、质量差、缺乏安全感和社会保障的脆弱和非正规工作。平均而言，非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占了非洲总就业人数的 86% 左右，居世界首位。工资和薪水工人仅占总就业人数的 28%，其中北非的比例(69%)远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2%)。²⁴

14. 在北非，青年和女性的失业率特别高，其中年轻人失业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 3.5 倍，女性的失业率是男性的 2 倍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为她们更有可能作为家庭雇员劳作。据估计，有 33% 的劳动女性作为家庭雇员劳作，相比之下，劳动男性的这一比例只有 15%。

15. 非洲的经济增长大多来自资本密集型采掘业和低收入服务部门的工作。通过工业化对非洲经济进行重大结构转型，可为创造足够多的能增加就业、消化劳动力预计增长的体面工作提供最佳机会。农业也是青年就业机会的潜在来源，特别是有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帮助之后。这些技术能通过机械化和天气条件监测等途径推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能通过促进扩大市场、增加农民市场准入来改进农艺实践。²⁵

D. 教育和卫生

16. 尽管政府增加了初等教育支出，进而提高了小学入学率，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最高的教育排斥率。2018 年，该地区约有五分之一(19%)的小学适龄儿童、超过三分之一(37%)的初中适龄青少年和超过一半(58%)的高中适龄青年失学。北

²⁰ 妇女署，《2019-2020 年世界妇女的进步》。

²¹ Quentin Wodon 和 Bénédicte de la Brière，“未实现的潜力：收入中性别不平等的高成本”，《性别不平等的成本说明》，第 1 号(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2018 年)。

²²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9 年趋势》(2019 年，日内瓦)。

²³ 非洲开发银行，《2019 年非洲经济展望》，(2019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

²⁴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²⁵ Célestin Muna、Abebe Shimeles 和 Andinet Woldemichael 编，《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战略、政策和工具》，政策研究文件，第 2 号(非洲开发银行，科特迪瓦阿比让，2019 年)。

非的相应比率则低得多，分别为 9%、14%和 30%。就人数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全世界 5 900 万小学适龄失学儿童中占了一半以上(3 200 万)，在全世界 6 200 万失学青少年中几乎占了一半(2 800 万)，在全世界 1.38 亿失学青年中占了 27%(3 700 万)。²⁶

17. 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方面的性别差距很大，女童更有可能永久受到教育排斥。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400 万女童永远上不了学，相比之下，这样的男童人数只有 200 万。在北非，女性的劣势更大：每 3 个失学女童中就有 1 个永远接受不到任何正规教育，相比之下，这样的男童每 25 个中只有 1 个。教育质量往往也很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小学毕业时能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达到最低熟练程度。自 2000 年以来，该地区训练有素的教师比例也一直在下降，因此 2017 年只有 64%的小学教师和 50%的中学教师接受过最低要求的培训。

18. 非洲多国政府都将提供优质普及教育列入了自己的议程，但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公共支出普遍不足，因此要靠私人支出进行补充，并在某些情况下仰赖国内或国外提供的奖学金。近来，非洲学生到中国 and 印度留学的趋势越来越大，凸显了南南合作的互补作用。自 2000 年以来，中非合作论坛一直为非洲专业人士和学生提供来华短期培训和大学长期学习的奖学金。已承诺的奖学金数量从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的 3 万份增加到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的 5 万份。²⁷

19. 得益于对最紧迫卫生需求的投资，非洲人口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2010 年至 2015 年和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婴儿死亡率从每 1 000 例活产死亡 56 例下降到每 1 000 例活产死亡 47 例，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84/1000 下降到 71/1000，出生时预期寿命由 60.3 岁提高到 62.7 岁。²⁸ 孕产妇死亡率也有所下降：2000 年至 2017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54%，北非下降了 38%。虽然北非的孕产妇死亡率目前处于中等水平(2017 年估计每 10 万例活产中有 112 例孕产妇死亡)，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率仍然很高(2017 年每 10 万例活产中有 542 例孕产妇死亡)。²⁹

20. 下呼吸道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腹泻病是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由于疟疾、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腹泻病的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尽管如此，各国仍需加强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干预措施，以防这些

²⁶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新方法显示有 2.58 亿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失学”，情况报道，第 56 期，2019 年 9 月。

²⁷ 教科文组织，《2019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民、流离失所和教育——建桥而非建墙》(2018 年，巴黎)。

²⁸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订正本》，网络版可查阅：<https://population.un.org/wpp/>。

²⁹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等，《孕产妇死亡率趋势：2000 年至 2017 年》(世卫组织，日内瓦，2019 年)。

疾病成为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与这些疾病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非洲下降幅度最小。³⁰

21. 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如埃博拉病毒病，对非洲人的健康构成额外的威胁。2019 年 10 月 21 日，10 个国家——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南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核可了一个联合框架，据以加强在防备和应对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疾病爆发方面的跨境合作。这种机制通过分享资产，预计将有助于减少痛苦，并将疫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降至最低。³¹ 该框架不包含任何应急和防备方面的资金承诺，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于 2015 年设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使世卫组织有能力快速应对疾病爆发和突发卫生事件，挽救生命并降低长期成本。捐助者在 2018 年捐款 3 800 万美元，是 2017 年的三倍以上。

22. 在非洲，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卫生系统的表现普遍很差。各国能提供的卫生和卫生相关服务只占其人口所需总量的 48%。此外，卫生系统只发挥了 49%的潜在功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全民健康覆盖的具体目标，各国不仅需要增加服务的可得性，消除获得保健服务的财政障碍，而且还需要提高其卫生系统的表现水平，以便惠及得不到充分服务的群体。³²

E. 粮食安全和农业

23. 非洲饥饿人数一直在增加，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营养不良的普遍率从 18.3%上升到 19.9%。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比率从 20.9%上升到 22.8%。非洲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也稳步增加，从 2015 年的 2.18 亿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2.56 亿人，其中 90%以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³³

24. 粮食安不安全不仅要看有多少人饥饿，也要衡量有多少人得不到有营养和足够的食物，因此非洲粮食不安全水平要高得多，影响到该大陆一半以上的人口，而且仍在升高。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总人口中严重或中度粮食不安全的普遍率在非洲从 48.3%上升到 52.5%，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从 54.2%上升到 57.7%、北非从 22.9%上升到 29.5%。在此期间，非洲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数也有所增多，从 5.77 亿人增加到 6.76 亿人，2018 年其中 90%以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尽管近来在儿童营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各种形式的儿童营养不良挑战。儿童发育迟缓的患病率从 2015 年的 32%略微下降到 2018 年的 30%，但在此期间发育迟缓儿童的人数却从 5 050 万增加到 5 880 万。后一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发育迟缓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39%)。5 岁以下儿童超重的比例也开始

³⁰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的卫生状况：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卫生、卫生服务和卫生系统状况分析》(布拉柴维尔，2018 年)。

³¹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十个非洲国家核可埃博拉疫情防备和应对跨境合作框架”，2019 年 10 月 21 日。

³²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的卫生状况》。

³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防止经济放缓和下滑》(2019 年，罗马)。

下降，从 2015 年的 6% 下降到 2018 年的 4.9%，但 2018 年非洲两个次区域的儿童超重率为全世界最高，其中北非为 10.6%、南部非洲为 13%。³⁴ 35

26. 这些趋势强调了到 2030 年在非洲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的困难。冲突和极端天气事件是非洲大陆粮食危机的一个主要起因。的确，非洲不成比例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许多本就是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更长时间的干旱改变了农民和当地社区的日常生活，对农作物和牲畜带来重大损失。乌干达最近的贫困率从 2012 年的 35.9% 上升到 2016 年的 41.6%，起因就是干旱和虫害。³⁶ 此外，经济放缓也损害了粮食安全和营养，在不平等现象更严重的地方尤其如此。³⁷

27. 鉴于非洲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农业部门在就业和产出中占了很大份额，农业在非洲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和 2014 年《关于加快农业增长和转型、促进共同繁荣和改善生计的马拉博宣言》，非洲领导人承诺将公共支出的至少 10% 分配给农业部门，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村收入，减少贫困，创造就业和增加机会，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增强复原力。2017 年关于《马拉博宣言》执行情况的首份两年期报告介绍了非洲联盟成员国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的表现，显示在报告取得进展的 47 个国家中，只有 20 个正常执行了规划，有望在 2025 年之前实现《综合方案》和《马拉博宣言》中所作的承诺。

28. 《综合方案》和《马拉博宣言》推动许多国家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为了应对 2006 年以来因农业部门面临许多冲击而经历的经济放缓，塞内加尔自 2009 年以来每年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上分配给农业部门，并承诺对该部门进行转型。该国在花生盆地实施了农业价值链支持项目，因为在全球花生价格下降后该地区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水平显著上升。该项目成功地加大了农作物商业化，并帮助农民转向了家禽饲养和蔬菜种植等其他活动。在参与该项目的家庭中，作物收入和总收入分别增加了 48% 和 11%。³⁸

F. 社会保障

29. 事实证明，社会保障通过增加食品、保健和教育获取机会，在减少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提高生产能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非洲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极低，只有 18% 的人口能获得社会保障福利。非缴费性社会援助主要面向老年人。缴费性社会保险则大多局限于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工人(不到经济活动人口的 15%)及其家人。只有极少的社会保障提供给最弱势群体，包括在非正规

³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水平和趋势：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关于儿童营养不良的联合评估——2016 年版主要结果》，2016 年 9 月。

³⁵ 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儿童营养不良水平和趋势：儿基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关于儿童营养不良的联合评估——2019 年版主要结果》，2019 年 3 月。

³⁶ 世界银行，《2018 年贫困与共享繁荣：贫困拼图》(2018 年，华盛顿特区)。

³⁷ 粮农组织，《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³⁸ 同上。

经济部门工作的人、儿童、有新生儿的母亲、残疾人、穷人、失业者和粮食不安全的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获得保健机会是非洲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需要得到社会援助。³⁹

30. 大多数非洲国家最近已将社会保障列为优先事项，并已通过或正在制定国家保障计划。许多国家也将社会保障纳入了本国发展计划的主流。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采取更全面的做法，将社会保障与生产部门(例如农业)和社会部门(卫生、教育、水和环境卫生)联系起来，成功地加大了对贫困和粮食安全的影响。⁴⁰

31. 然而，仍然存在许多挑战，包括供资高度依赖捐助者，对社会保障的预算拨款不足，使得供资不可持续，且规模难以扩大。毛里求斯和南非是为数不多的通过国内收入为社会保障支出提供资金的非洲国家。平均而言，社保支出(不包括保健支出)仅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5.9%、北非国内生产总值的 7.6%。

32. 非洲各国应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资，并优先将社保覆盖面扩大到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作为使其工作条件正规化并得到改善的手段。它们还应加大投资力度，以制定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计划，并实行全民健康覆盖制度。

G. 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

33. 尽管大量官方发展援助投向了获取安全饮用水和改善环境卫生方面，但非洲在该部门仍处于极低水平。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能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仅为 23.7%，北非能获得适当环卫设施的人口比例为仅 25.1%。⁴¹

34. 非洲已有几项全区域倡议和承诺，旨在加大努力，增加所有人获得水和环卫服务的机会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供水和环卫倡议》，这是 2003 年发起的一项区域努力，旨在增加非洲农村地区获得水、环卫和个人卫生服务的机会。该倡议最初是作为一个区域合作框架产生的，目的是支持实现非洲水资源设想和千年发展目标。目前，它则支持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增加农村社区持续获得和使用水和环卫服务的机会，为减少贫困作出了贡献。

35. 非洲在增加农村地区获得水、环卫和个人卫生服务的机会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2017 年，约有 2.63 亿农村居民获得了饮用水基本服务、1.29 亿人获得了环卫服务、6 700 万人家中拥有备有肥皂的洗手设施。然而，非洲农村的大量人口仍然无法获得水、环卫和个人卫生服务，其中约有 3.39 亿人没有基本的饮用水、4.73 亿人没有基本的环卫服务、5.35 亿人家中没有基本的洗手设施。⁴²

³⁹ 劳工组织，《2017-2019 年世界社会保障报告：通过普及社会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 年，日内瓦)。

⁴⁰ 粮农组织，《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⁴¹ 《2018 年非洲可持续发展报告：迈向一个完成转型、富有韧性的大陆》(联合国出版物，出品编号：E.19.II.K.1)。

⁴² 同上。

36. 关于基础设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基础设施服务质量低劣、价格昂贵，限制了高达 40% 的生产力，并使非洲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减少大约 2%。⁴³ 2017 年，全世界每 10 人中就有近 9 人能用上电，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 44% 的人能用上电，估计相当于有 5.73 亿人缺电。⁴⁴

37. 2017 年，非洲用于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估计为 816 亿美元，高于 2016 年的 669 亿美元。然而，如果非洲要弥合其基础设施缺口，这一投资额仍远低于 2025 年之前每年所需的 1 300 亿至 1 700 亿美元。最大的投资者是非洲国家和地方政府，其供资总额从 2016 年的 307 亿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344 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其投资总额从 64 亿美元增加到 194 亿美元。在非洲，拥有健全的制度安排和银行肯担保的项目的国家吸引了更多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的投资。此外，除了赠款和贷款等传统工具外，可供利用的还有混合融资和发展资本等新的金融工具。⁴⁵

38. 这些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支持非洲联盟区域基础设施全大陆框架——《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为了促进非洲内部贸易，提高非洲大陆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该《方案》提出了到 2020 年要实现的短期目标、到 2030 年要实现的中期目标和到 2040 年要实现的长期目标。非洲内部贸易虽然规模仍然很小，但一直在增长，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从 1995 年的 2.6% 提高到 2013 年的 4.5%。据估计，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到 2040 年将使非洲内部贸易的价值进一步提高 15% 至 25%，到 2050 年将使经济产出增加 29 万亿美元。⁴⁶ 然而，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将取决于非洲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持人员和货物在整个大陆轻松流动所需的基础设施。该《方案》有望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对基础设施发展采取了综合办法。

39. 该《方案》的优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包含一整套能源、运输、跨境水管理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优先项目和方案，将实施到 2020 年，所需投资为 680 亿美元。总资金的 95% 设定用于能源和交通，这两个部门需要最具变革性的投资，以支持非洲贸易和一体化，促进增长并创造就业。⁴⁷ 优先行动计划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a) 修建公路 16 066 公里、铁路 4 077 公里；(b) 建设电网输电线路 3 506 公里；(c) 将 17 个国家接上区域光纤电缆；(d) 通过该《方案》下设项目的建设和运作，创造直接就业机会 112 900 个、间接就业机会 49 400 个。⁴⁸

⁴³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等，“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进度报告：摘要更新”，2018 年。

⁴⁴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见脚注 9)。

⁴⁵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2017 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趋势》(2018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

⁴⁶ Landry Signé 和 Ameenah Gurib-Fakim，“一体化非洲的高增长前景”，布鲁金斯，2019 年 8 月 2 日。

⁴⁷ 见 www.au-pida.org/pida-pap/。

⁴⁸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等，《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进度报告》。

H. 善治

40. 2003 年，非洲联盟建立了非洲同行审议机制，作为监测成员国治理绩效和应用经验教训的工具。该机制的任务范围已经扩大，包括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63 年议程》的执行情况，并牵头编写评估非洲治理状况的《非洲治理报告》。截至 2019 年 2 月，已有 37 个非洲联盟成员国加入该机制，其中 21 个国家接受了审议。⁴⁹

41. 据该机制称，非洲治理状况总体有所改善。各国取得成绩最大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治理和管理及公司治理领域的满意绩效。各国在民主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成绩最小，但已经出现一些进展，许多国家现在有更多的定期选举、更多的政党和更大的政治空间。⁵⁰

42. 妥善管理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实现非洲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仍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良好的自然资源治理要求各种机构(公共和私人及正式和非正式)具备高效管理资源以及拟订、实施和执行健全政策和法规的授权与能力。如要这些机构及其领导人做出有益于非洲国家长期增长和发展的明智决定，问责制和透明度至关重要。⁵¹

43.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正在实施捐助国和国际机构支持的治理框架，例如被称为金伯利进程的天然生产业透明度倡议。这些安排增加了一层面向外部的问责制，但并不总是支持国内机构实现相辅相成或非洲内部开展合作与共同学习，而这些都是上述机制有意推动的。

44. 作为更广泛的自然资源行业治理改革的一部分，需要加强私营部门的参与。改革应着眼于自然资源行业中的私营公司管理、政府机构监测和监管私营公司的能力、既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又保护公共利益的立法质量以及非法资金流动问题。整个价值链管理应当透明，并纳入包括议会和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

三. 伙伴关系和资源调动促进发展

A. 国内资源

45. 国内资源比外部资金更可预测，因此仍是发展融资的最重要来源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和发展规划的关键。公共资源还提供自主权和政策空间，供各国政府酌情使用，实现本国发展优先事项。就数量而言，它们迄今是各国政府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

46. 税收在国内资源调动中发挥关键作用。2017 年，非洲国内税收超过 5 200 亿美元(2015 年为 4 368 亿美元)，与之相比，外部资金总额为 1 937 亿美元(2016 年

⁴⁹ 非洲联盟，《非盟大会第三十二届常会的决定、宣言、决议和动议》(亚的斯亚贝巴，2019 年)。

⁵⁰ 非洲同行审议机制，《非洲治理报告：促进非洲联盟共同价值观》(2019 年)。

⁵¹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治理报告五：自然资源治理和国内资源调动促进结构转型》(亚的斯亚贝巴，2018 年)。

为 1 708 亿美元)。⁵² 区域税收(不包括自然资源行业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13%升至 2017 年的 16%。⁵³ 然而,这一比率不足以满足收入要求,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低比率源自庞大非正规经济部门造成的税基狭窄以及征税效率低下。

47. 为了提高税收能力,非洲国家应在中长期作出重大努力,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立场,审查和优化税收政策,扩大和深化税基,实施专业税种(如资助卫生保健的消费税),加强非税征收,并发展和更新机构(例如利用数字化)以改善税收征管。如果实施上述财政改革并防止偷税漏税,政府年度收入增额可达 GDP 的 12-20%。⁵⁴

48. 遏制造成重大资源损耗的非法资金流动及打击腐败也可迅速和显著地促进非洲国内资源调动。据估计,非法资金流动导致非洲每年损失 500 亿至 800 亿美元。这些流动主要来自商业活动,如逃税、虚开贸易发票和滥用转让定价。因此,许多国家通过政策、建立机构并颁布法律,打击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然而,积极变革的最重要驱动因素是持续的政治意愿和负责任的领导层。⁵⁵

B. 私人资本流动

49. 作为私人资本流入的最大来源,侨汇是对非洲的组合投资额的近两倍。侨汇继续增长,2017 年达到 690 亿美元,高于 2016 年的 620 亿美元。2017 年到 2018 年,侨汇增长 9%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从 420 亿美元增至 460 亿美元,北非从 570 亿美元增至 620 亿美元。⁵⁶ 大多数非洲国家通过正式渠道收到的侨汇现已超过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的流入金额。此外,通过非正式渠道转账的侨汇可能是正式渠道转账额的一半。鉴于非洲境内高昂的转账费用和有限的银行服务使民众不愿使用正式渠道汇款,应当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条例,以降低转账费用、改革金融体系并提高非洲侨汇投资的透明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作为发展筹资关键资源的侨汇流入。⁵⁷ 尼日利亚是侨汇流入最多的国家,2018 年官方侨汇总额为 243 亿美元。

50. 与此同时,直接外资流入从 2008 年 581 亿美元的峰值降至 2017 年 418 亿美元的 10 年低点。全球金融危机是造成上述减少数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初级产品的需求和国际价格走低以及全球贸易局势紧张。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不断攀升,投资者也一直在重整投资组合。

⁵² 非行,《2019 年非洲经济展望》(见脚注 23)。

⁵³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9.I.7)。

⁵⁴ 《2019 年非洲经济报告》(见脚注 8)。

⁵⁵ 非洲联盟委员会,《国内资源调动: 打击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宣传简报,2019 年。

⁵⁶ 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019 年 4 月。

⁵⁷ 非行,《2019 年非洲经济展望》(见脚注 23)。

C. 发展合作

51. 援助仍是非洲发展筹资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脆弱国家以及受冲突影响国家。遗憾的是，2018 年的发展援助减少，特别是对最需要援助的最不发达国家国家和非洲国家而言。向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增长 3.9%，⁵⁸ 而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的官方发展援助实际价值减少了 4%。⁵⁹ 2017 年，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达到 518 亿美元。然而，大多数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仍远低于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作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额。

52. 2017 年，向非洲提供了 80% 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前 10 大捐助方是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非洲开发银行(非行)、法国、日本和加拿大。得到近一半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最大的受援国是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乌干达、摩洛哥、莫桑比克和索马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和民间社会组织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援助。⁶⁰

53. 除了传统的发展援助外，来自私人基金会的资金正变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在卫生、人口和生殖健康部门。南南和三方合作正在扩大，区域经济共同体、大陆组织(非洲联盟、非洲联盟发展署和非行)及联合国机构都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非洲区域股为非洲联盟拟订非洲与新兴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作出了贡献。该股与非盟发展署合作制定了南南合作政策框架。⁶¹

54. 南南合作可以是非洲内部的合作，也可以是非洲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在教育能力建设部门，非洲内部合作范例包括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及非行共同资助的协调西非各地大学教育的项目；2000-2015 年期间向非洲各国学生颁发 31 476 份奖学金的阿尔及利亚奖学金方案；为非洲善治和经济发展开展人力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

D. 债务减免

55. 债务减免是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援助的一部分。它确保维持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迄今已有 30 个非洲国家通过重债穷国倡议及其衍生的多边减债倡议获得了全部债务减免。在健全的经济管理和减贫战略的前提下，这些债务减免倡议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公债中位数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在 2012 年降至约 31%，远低于重债穷国倡议之前的水平。非洲国家得以利用额外资金增加社会支出，改善债务管理，促进减贫。另外三个

⁵⁸ OECD, “Development aid at a glance: statistics by region – Africa”, 2019 年。

⁵⁹ OECD, “Development aid drops in 2018, especially to neediest countries”, 2019 年 10 月 4 日。

⁶⁰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8*(见脚注 10)。

⁶¹ 劳工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南南合作促进非洲体面工作》，2017 年 3 月。

国家(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有资格获得重债穷国倡议规定的援助。索马里和苏丹有巨额欠款,必须在开始接受上述倡议规定的债务减免之前清理。⁶²

56. 近年来,日益严重的债务脆弱性和可持续性再次成为一个主要关切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持续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债务困扰。债务中位数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从2013年的36%升至2018年的55%。国内和外部债务共同推动公共债务不断增长。2018年,近一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困扰或面临债务困扰的高风险,而五年前的比例为22%,其中包括大多数从此前债务减免工作中受益的国家。⁶³

57. 非洲各国政府及其发展伙伴应采取必要措施,解决脆弱性并遏制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包括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以加强征税治理,从而减少债务筹资需求。此外,在打击非法资本流动和遣返被盗资金方面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和协作将有力地促进减少发展筹资需求。开发银行亦应扩资,以便在非洲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非洲债务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基础设施建设贷款。⁶⁴

四. 更加协调一致地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年议程》

58. 本节重点介绍联合国各实体和非洲联盟在执行《2030年议程》和《2063年议程》方面的当前活动和具体干预措施(通常是联合执行),重点介绍《非洲联盟-联合国执行<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框架》的三个交叉主题领域。

A. 倡导联合执行

59. 成功执行《2030年议程》和《2063年议程》需要强有力和持续的运动,以提高决策者和广大公众的认识。需要良好理解两个议程的内容及其与国家背景和优先事项的相关性。非洲联盟、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显示了议程之间的实质性协同作用和补充作用。⁶⁵

60. 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正向非洲联盟信息和通信局提供支持,协助实施《2063年议程》传播战略,同时确保与《2030年议程》保持一致。提供支助的方式是各种高级别会议,如特别顾问办公室每年举办的非洲对话系列,为有效和注重成果地执行《2030年议程》和《2063年议程》打造宣传平台。

⁶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重债穷国倡议规定的债务减免》,情况概览,2019年3月19日。

⁶³ Carlos Lopes, *Africa in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Doubt*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⁶⁴ 基金组织,《重债穷国倡议规定的债务减免》。

⁶⁵ 《2018年非洲可持续发展报告》(见脚注41)。

61. 开发署支持非洲联盟委员会、区域经济共同体和会员国开展直接政策宣传、参与活动、为拟订非洲联盟私营部门战略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就非洲包容性市场卓越中心和影响力投资倡议向非洲联盟委员会经济事务部及贸工部提供相关支助，从而推进实地执行涉及经济转型、融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的《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卓越中心的目标是成为首屈一指的泛非区域平台，促进包容性商业和包容性市场方面的思维引领和行动，确定、推动和推广政策、方案拟订及伙伴关系方面的最佳实践和创新，最终目标是促进非洲的包容性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⁶⁶

B. 加强国家能力

62. 非洲经委会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区域经济共同体、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和开发署合作，继续牵头开发综合规划和报告工具包，用于将《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统筹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减少就两个议程提交报告的事务费用，并跟踪国家和国际商定发展议程的绩效。与现有工具包相比，综合规划和报告工具包的优势是全面、具体、灵活、具有前瞻性、基于网络并能跟踪两个议程的进展情况。已使用埃塞俄比亚 2015-2019 年期间第二个增长和转型计划成果框架中的数据对其进行了测试。⁶⁷

63. 开发署编制了一个关于将可持续发展目标、《2063 年议程》、《巴黎协定》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及其他政策或战略框架主流的工具和指导说明。国别报告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开发署年度联合报告被用作监测和评价机制。

64. 非洲经委会负责协调的次区域协调机制为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组织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发展伙伴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推动开展次区域一级协调和联合活动增加了一个新层面。2019 年 6 月，第六次北非次区域协调机制会议与会者商定了订正联合路线图，支持在 2019-2020 年期间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涵盖五个主题领域：(a) 推广、宣传、监测和报告《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的执行情况；(b) 就业；(c) 粮食安全；(d) 气候变化；(e) 区域一体化，包括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执行和监测框架的特点是为每个专题领域制定了详细计划。

65.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秘书处一直支持各国编写自愿国别评估。提供此类支持的方式包括编制一份关于各国如何编写和介绍自愿国别评估的手册，以及组织讲习班和专家组会议以提高对两个议程的认识并交流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公共行政学校课程的主流。每年，自愿国别评估报告的

⁶⁶ 非洲联盟委员会和开发署，《非洲包容性市场卓越中心概览》，2016 年。

⁶⁷ 非洲经济委员会，《将〈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问题》，2017 年 7 月。

质量都有所提高，各国在报告中增加了对进展情况说明的分析。2016 年至 2019 年，36 个非洲国家开展了自愿国别评估，其中 16 个国家在 2019 年首次参与。⁶⁸

66.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已商定合作加强统计能力，因为目前许多非洲国家提供及时、准确和分类数据的能力不足，以可用格式向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数据的方法有限。希望非洲国家能够利用非洲统计系统生成及时、可靠和统一的统计信息，涵盖非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的各个方面。然而，该系统正面临一些挑战，非洲联盟委员会、非洲经委会、非行、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开发署正在合作开展培训者培训，将非洲统计协调战略这一应对这些挑战并支持非洲一体化议程的全非洲努力纳入国家和区域统计发展战略。

C. 综合监测和报告框架

67. 非洲区域协调机制和次区域协调机制构成联合国系统努力支持非洲联盟及其机构，包括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实现优先事项的框架。该机制现由非洲经委会-非洲联盟委员会联合秘书处提供服务。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已经商定该机制各群组的共同工作方案。最近，非洲经委会建议区域协调机制和次区域协调机制制定一个注重成果的业务监测和评价框架，并纳入适当的报告模板，有效衡量商定优先领域的执行进展情况。

68. 若干联合国实体已经在支持会员国建立综合监测和报告框架。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正在开展一个关于加强各国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能力的发展账户项目。该项目有三个组成部分：(a) 采用一种统计能力评估方法，目前在六个非洲国家运行；(b) 关于建立国家报告平台的拟议原则和准则，在 2018 年 3 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进行了编写和讨论；(c) 关于在非洲国家执行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以传播数据的培训和指导。

69. 此外，大会第 66/293 号决议授权联合国监测发展伙伴及非洲国家对非洲发展所作承诺的执行情况。大会在同一决议中请秘书长每两年提交一次监测机制报告，并要求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担任秘书处，与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协调开展审查。报告提供了关于非洲国家和发展伙伴(传统伙伴、新伙伴和新兴伙伴)执行支持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的最新数据和分析。报告还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有用投入并支持非洲国家参与论坛，从而协助在全球一级对《2030 年议程》采取后续行动和审查。

70.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还与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协作，联合为北非各国统计机构举办讲习班，介绍与北非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63 年议程》指标所涉概念和方法。合作伙伴根据需要向各国统计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以提高对两个议程的指标的认识，并建设报告非洲进展情况的能力。

⁶⁸ 见 www.un.org/en/africa/osaa/events/2019/hlpf.shtml。

五. 结论和建议

7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推动了实现进展，并改变了非洲各国政府及其发展伙伴看待非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差距和挑战的方式。过去十年，在改善生活水平和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进展仍然缓慢和不均衡，特别是在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这一总体目标以及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方面。

72. 为进一步促进非洲的社会进步，并提高联合国各机构在《2030 年议程》、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2063 年议程》的社会层面的工作成效，委员会不妨审议以下建议：

(a) 非洲国家应继续优先考虑通过结构转型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和战略，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抗击不平等现象，为所有人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b) 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决策者应继续倡导健全治理，注重提供每个公民有权期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普及教育、全民健康覆盖和社会保障，包括最低保障、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

(c) 联合国发展系统相关实体，包括重振活力的驻地协调员制度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非洲联盟各实体，应协助和支持各国努力落实《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规定的非洲发展优先事项，包括将两个议程纳入国家规划框架。联合国系统应继续协助各国加强国家统计能力并监测社会保护制度，以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和优先事项；

(d) 联合国系统应通过非洲区域协调机制及其调整后的群组，继续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向非洲提供支持，改善区域和国家两级的政策一致性。联合国系统还应协调一致地支持成果监测和报告，以减少事务成本，避免重复工作，并提高可用资源的成效；

(e)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非洲联盟各机构应继续进行更正式和一致的协调。联合国系统可支持非洲联盟发展署执行任务，包括实现《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支持方式包括分享政策研究和开发知识产品的能力。